

南阳麒麟岗汉画像石墓天象图 及相关问题

王 煜

关键词：河南 画像石 天象图 太一 汉代

KEYWORDS: Henan Stone Reliefs Celestial Maps Taiyi (the Supreme Unity) Han Dynasty

ABSTRACT: On the ceiling of the antechamber of a stone relief tomb of the Han Dynasty at Qilingang (Kylin Ridge) in Nanyang City, Henan, there is a very important celestial map. In the center of the map is seated image of Taiyi (the Supreme Unity, or the highest lord of the heaven) surrounded by the Four Supernatural Beings (the Azure Dragon, the Scarlet Bird, the White Tiger and the Sombre Warrior), the sun, the moon, the Big Dipper and the Milk Dipper (the constellation composed of the μ , λ , ϕ , σ , τ and ζ Sagittarii); the trident-shaped crown on his head would be the “celestial crown” mentioned in the historic literature, which was the symbol of the “Spear of the Supreme Unity” composed of the sun, the moon and the Big Dipper; the scene of the Four Supernatural Beings (which might represent the Five Emperors) surrounding the Taiyi showed that the Taiyi was attended by them. The Big Dipper and Milk Dipper symmetrically flanking the Taiyi showed that they, who were the major master of fate and minor master of fate, were also attending the Taiyi. The Taiyi worship in the Han Dynasty had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thought of ascending immortal on Kunlun Mountain.

1988年，在河南南阳市西郊麒麟岗发现一座大型汉代画像石墓，其前室墓顶上有一幅巨大的天象画像。该画像严整的布局及其中心出现的天帝形象，使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韩玉祥、牛天伟先生对其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研究^[1]，揭示了此画像的性质和基本内容。近年来该画像石墓的发掘报告也得以出版，并附有相关的考释研究^[2]。由于该画像的重要性，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文献材料，对比分析其他材料，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仍有必要，将有助于对该画像一些具体问题的深入探讨及其整体意义和内涵的理解，也有助于汉代太一信仰及一些相关问题

的进一步讨论。于是笔者不揣浅薄，略呈陋见于下。

一、太一与四象、五帝

麒麟岗汉代画像石墓为砖石混砌，由并列的两个墓门、一个横长前室和并列的三个主室组成，墓内画像十分丰富。天象画像位于横长前室顶部，由九块条石组成，长3.8、宽1.3米。其上满布云气纹，中心为端坐人像，面目不清，头戴三叉形冠。人像四周按方位环绕四象，青龙居左（以人像自身方位为准，下同）、白虎居右、朱雀在上、玄武在下。若站在墓中仰视画像，则十分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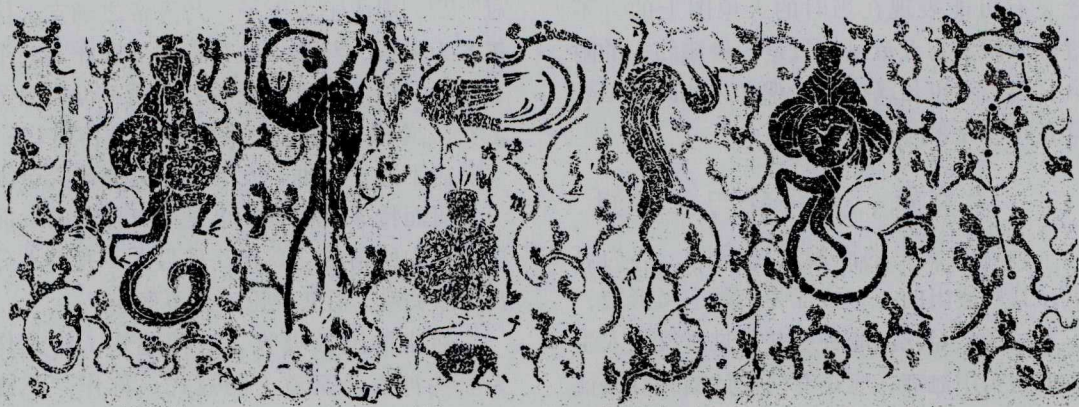
作者：王煜，成都市，610064，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合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的天象配置，而且龙、虎头南尾北，龟、鸟头西尾东的设计也合乎天象。青龙白虎两侧为汉画像中常见的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形象，伏羲捧日居东，女娲捧月居西^[3]。伏羲之外为北斗七星，女娲之外为南斗六星。四象、日月、南北斗有序地组合在一起，无疑是一幅系统化的天象图。虽然该天象图没有完全按照天象来配置画像^[4]，然而其严密的系统性是一目了然的（图一）。

居于此天象图中心的应即天极星——太一（泰一），以人像表现出来，即是最高天帝^[5]。《史记·天官书》云：“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易纬乾凿度》郑玄注：“太一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一”^[6]。天极星处于天之中心（即北极、北辰），根据汉代以天文比附政治的思想，自然为最高天帝所居，则太一即是最高天帝，又称上帝、太帝、皇天上帝、天皇大帝、昊天上帝^[7]。《史记·封禅书》正义云：“泰一，天帝之别名也。”《汉书·李寻传》云：“紫宫极枢，通位帝纪”，颜注引孟康曰：“紫宫，天之北宫也。极，天之北极星也，枢是其回转者也。《天文志》曰：‘天极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太一，天皇大帝也，与通极为一体，故曰通位帝纪也”。《尔雅·释天》云：“北极谓之

北辰”，郑玄注：“天皇，北辰耀魄宝，又云昊天上帝，又名大一常居。以其尊大，故有数名”^[8]。《尚书·虞书·舜典》马融注亦云：“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宫，天之最尊者”^[9]。

画像上太一的周围围绕着四象，这当然是中宫周围围绕四宫的天象象征。不过根据当时的一些文献，或许还可能是五方天帝夹辅太一的反映。《春秋文曜钩》云：“东宫苍帝，其精为青龙。南宫赤帝，其精为朱鸟。西宫白帝，其精为白虎。北方黑帝，其精为玄武。黄帝含枢纽之精，其体璇玑，中宿之分也。中宫大帝，其尊北极星，含元出气，流精生一也”^[10]。即以四象为四帝的化身夹辅中宫大帝——北极星，与画像上的天象配置完全相合，因此画像中的四象或许也可解释为夹辅太一的四方天帝。这里的“中宫大帝”为北极星，自然是太一而非意见黄帝，有人根据类似文献将画像中心的人像解释为黄帝^[11]是不确切的。由于汉武帝以太一为最高天帝，太一居于中宫，占了中央黄帝的位置，所以黄帝就无法在这样的图式中表现出来了。武帝在甘泉祭祀太一以五帝配祭，太一坛居于中央，高为三层，“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但由于太一占了中央，黄帝坛便安排在西南隅^[12]。西南为坤地，也合乎黄帝之土德，但这样的配置无



图一 河南南阳麒麟岗汉画像石墓前室墓顶画像拓本
（采自黄雅峰、陈长山：《南阳麒麟岗汉画像石墓》第62页图42，三秦出版社，200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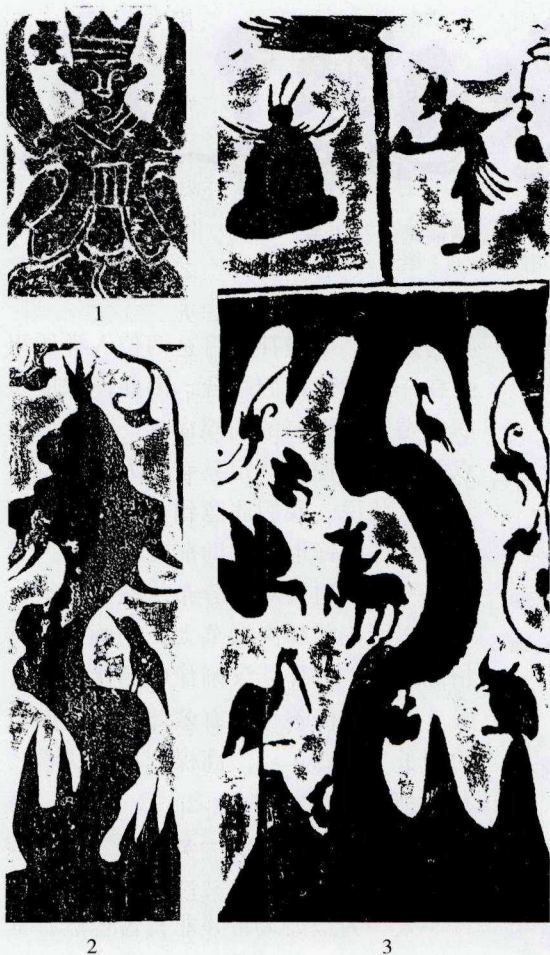
法在天象图上反映。上引《春秋文曜钩》云：“黄帝含枢纽之精，其体璇玑”，《史记·天官书》云：“北斗七星，所谓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显然这里是以北斗为黄帝了。汉代确实有以北斗为黄帝的观念（后详），此处的黄帝是否由画像中的北斗来体现？可存疑。但上引文献确实提示此种图式可能与五方天帝夹辅太一的观念有一定的联系。汉武帝时期以来，以太一为最高天帝，而五方天帝（东方苍帝太皞、南方赤帝炎帝、西方白帝少昊、北方黑帝颛顼、中央黄帝轩辕）为太一之辅佐。《史记·封禅书》云：“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又云：“五帝，太一之佐也。”《汉书·王莽传》载王莽派往四夷的使团组成为：“五威将乘乾文车，驾坤六马，背负鸞鸟之毛，服饰甚伟。每一将各置左右前后中帅，凡五帅。衣冠车服驾马，各如其方面色数。将持节，称太一之使；帅持幢，称五帝之使。”“乾文车”，颜注引郑氏曰：“画天文象于车也”，可见即“天文车”。上引王莽的造作是在附会天文。其每一将各置五帅，将称“太一之使”，帅称“五帝之使”，自然也是对五帝夹辅太一的附会。东汉晚期的重列式神兽镜上常见“周罗容象，五帝天皇”的铭文，“五帝”即指五方天帝，“天皇”应指天皇大帝太一^[13]。这种观念是有可能表现在当时的天象图上的。不过，以四象为五帝可能只是一种谶纬中的附会，但确实也是汉代人的观念，此画像是否具有此种观念仍需谨慎。

二、天文冠、太一锋与三锋冠

画像上太一的面貌无法看清，甚为可惜，其最突出的一个特征为头戴三叉形冠，三叉呈锋状竖立。此种冠并不见于汉代人生活中的实用冠饰，应是专门设计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神冠，或即《汉书·王莽传》中提到的“天文冠”。传云：“莽使尚书劾（孔）

仁：‘乘乾车，驾𩇑马，左苍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右杖威节，左负威斗，号曰赤星，非以骄仁，乃以尊新室之威命也。仁擅免天文冠，大不敬。’有诏勿劾，更易新冠。其好怪如此。”王莽好神怪，造作了一些天文神物，如“威斗”即象天之北斗，此“天文冠”亦是附会天文之造作。而上引文献中提到的左苍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及北斗与画像上的天文组合十分切合，因此笔者认为画像中太一所戴之冠或为文献中提到的“天文冠”。画像上的天文冠作三锋状。《史记·封禅书》载武帝“为伐南越，告祷太一，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太一三星，为‘太一锋’”。所谓“太一三星”，李零先生解释为太一及天一三星，天一三星与太一合则为一体，“一星在后，三星在前”，是为“太一锋”^[14]。画像中三锋状的天文冠或即象征合天一三星而成的“太一锋”，作为天帝太一的标志。画像上太一、日月、四象、南北斗的内容也多与上引文献一致，或见其间的关联性。类似这种三锋状的冠也存在于其他汉画像中，一般呈三个尖角，多出现于“周公辅成王”画像中周成王以及东王公、伏羲、“高谋”神的头上，一些性质不明的神人偶尔也用此冠（图二；图三）。一般称之为“山形冠”，孙机先生言其“名称不详，只能暂称之为王冠”^[15]。周成王为天子，乃天帝之嫡支；伏羲本为天帝，与太一关系密切（后详）；东王公是对应西王母出现的，而西王母为天帝之女。《穆天子传》载西王母自作歌曰：“嘉命不迁，我惟帝女”^[16]。其能戴天帝太一之冠而特显其尊贵，也是可以理解的。而汉画像中所谓的“高谋”神与太一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后文详论，兹不赘述。

后来的道教吸收了这种冠式，将其作为一些神人乃至道士的冠式，称作“三锋冠”、“三缝冠”或“三维冠”。如大致成书于魏晋时期的《老子中经》云：“东王父



图二 汉画像石上的东王公画像拓本

1. 山东郯城窑上村出土画像石 2. 陕西绥德出土墓门右立柱画像石 3. 陕西米脂出土墓门右立柱画像石
(1.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3·山东汉画像石》第58页图七一；2、3.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陕西山西汉画像石》第91页图一一九、第49页图六六)

者，青阳之元气也，万神之先也。衣五色珠衣，冠三缝，一云三缝之冠”；“太一君，人之侯王也。……冠三缝之冠”^[17]。《太平广记》卷一引《仙传拾遗》云：“木公，亦云东王父，亦云东王公，盖青阳之元气，百物之先也。冠三维之冠”^[18]。大致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称天师道士为“绛黄单衣三缝冠，佩天玉符跪吾前”^[19]。这些观念显然上承自汉代，结合文献与画像材料，可以肯定后来道教中所谓的“三缝之冠”乃是“三锋之冠”的误写，此种冠式应源自汉代太一、东王公之冠，后来道士亦可冠之。如上所述，汉画像中此种三锋状的冠多戴在地位特别突出的神人头上，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川、重庆地区东汉晚期画像中个别一般神仙、历史人物、方士头上也戴此冠（图四），其是否是后来天师道中上述观念的直接来源值得注意。

三、太一与“高媒”、伏羲、女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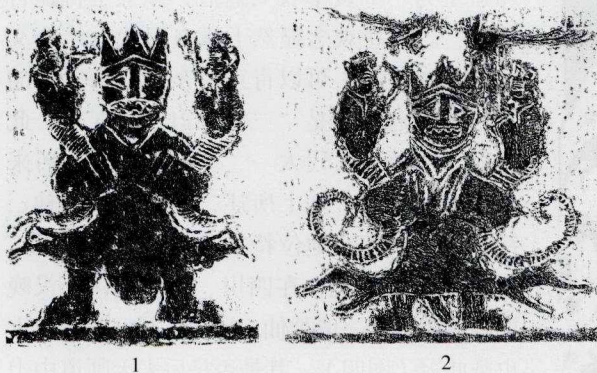
汉画像中有一种常见的形象，其上有一大神，头戴三锋形冠，双手分别抱住人首蛇身的伏羲和女娲（图五），不少人认为该神即为高媒神。《礼记·月令》郑玄注：“变媒言媒，神之也”^[20]。“媒”是“媒”的神化，高媒即为婚姻繁育之神。信立祥先生认为：“由于汉代习惯上将伏羲和女娲看作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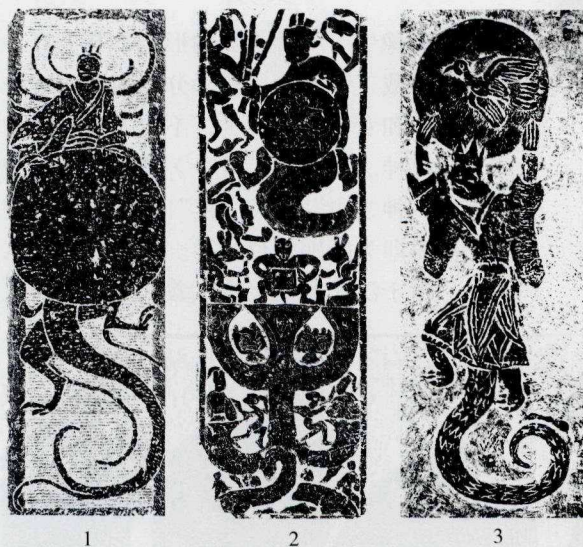
图三 山东嘉祥宋山出土祠堂西壁画像石上周公辅成王画像拓本
(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1·山东汉画像石》第66页图九一)



图四 重庆合川沙坪村出土墓室横额画像石拓本
(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7·四川汉画像石》第50页图六一)



图五 汉画像石上的“高谋”神画像拓本
1. 山东嘉祥花林村出土画像石局部 2. 山东嘉祥纸纺镇敬老院出土画像石局部 (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2·山东汉画像石》第116页图一二四、第107页图一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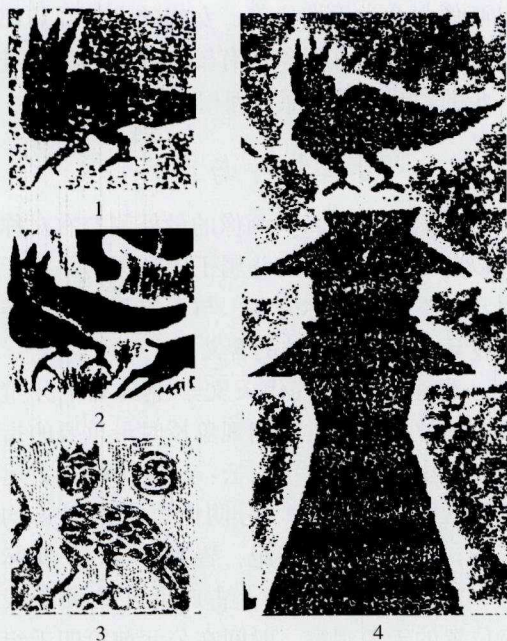


图六 汉画像石上的伏羲画像拓本
1. 河南南阳麒麟岗汉墓右门柱画像石 2. 山东临沂白庄出土画像石 3. 重庆合川出土画像石 (1. 采自黄雅峰、陈长山:《南阳麒麟岗汉画像石墓》第44页图版43, 三秦出版社, 2008年; 2. 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3·山东汉画像石》第20页图二三; 3. 采自龚廷万、龚玉、戴嘉陵编:《巴蜀汉代画像集》图352, 文物出版社, 1998年)

类的始祖, 而怪神却将这两位人类始祖抱在一起促使他们结合, 因此怪神应是职掌婚姻和继嗣的高谋之神”^[21]。该论点对此类画像的认定具有较大影响, 笔者暂从此说。我们注意到一些所谓的高谋神头戴三锋形冠, 即前文所论之“天文冠”, 两边又对称分布伏羲、女娲, 与本文所论麒麟岗汉墓太一的画像颇有相似之处。另外, 汉画像中的伏羲、女娲(尤其是伏羲)也有戴此种三锋形冠的例子(图六)。“高谋”神、伏羲、女娲何得戴天帝太一之冠? 其实, 高谋、伏羲、女娲与太一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太一为最高天帝并非自古皆然, 其在先秦本是一个哲学概念或楚人的“东皇太一”神, 汉武帝听从方士的建议始立其为最高天帝^[22], 汉代人以太一为最高天帝、以天极星为太一自然也是其时以天文、政治相互比附的结果。

太一作为神本是楚地信仰中的东皇。《楚辞·九歌·东皇太一》王逸注:“太一, 星名, 天之尊神。祠在楚东, 以配东帝, 故云东皇”^[23]。东帝即伏羲(伏牺、庖牺、太皞)。《淮南子·天文训》云:“东方木也, 其帝太皞, 其佐句芒, 执规而治春”, 高诱注:“太皞伏羲氏有天下号也, 死托祀于东方之帝也”^[24]。根据长沙子弹库出土战国楚帛书的记载, 伏羲、女娲为夫妻, 襄成天地, 化育人类^[25]。帛书



图七 汉画像石上的玄鸟画像拓本

1. 陕西绥德王得元墓墓室横额画像石局部 2. 陕西清涧出土墓门右立柱画像石局部 3. 山东济南出土画像石局部 4. 陕西子洲淮宁湾画像石墓墓室北壁横额画像石局部 (1、2、4. 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5·陕西山西汉画像石》第62页图八六、第151页图二〇二、第144页图一九三; 3. 采自《中国画像石全集3·山东汉画像石》第155页图一七四)

中称女娲为“女皇”。《初学记》卷九引《帝王世纪》云：“女娲氏亦风姓也，承庖牺制度，亦蛇身人首，一号女希，是为女皇”^[26]。可见，与伏羲相配的女皇女娲或亦可为东皇，东皇太一与伏羲、女娲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而伏羲、女娲置婚姻、化育人类，具有高谋的神性。《风俗通义》云：“女娲祷祠神祈而为女媒，因置婚姻，行媒始行明矣”^[27]。《初学记》卷九引《帝王世纪》云：“庖牺氏，风姓也，蛇身人首……制嫁娶之礼”^[28]。《白虎通·号》亦云：“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29]。《礼记·月令》孔颖达疏：“但不知初为媒者其人是谁？按《世本》及谯周《古史》，伏羲制以徧皮嫁娶之礼，既用之配天，其尊贵先媒当是伏羲也”^[30]。许多南方民族的神话传说也以伏

羲、女娲自成婚姻，为人类的始祖^[31]。而且从汉画像中伏羲、女娲多作交尾状的情况来看，汉代人的观念中伏羲、女娲具有高谋的神性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既然太一与伏羲、女娲关系密切，而伏羲、女娲具有高谋的神性，可知太一与高谋亦有密切关系。

“太一”在先秦又作“太乙”，“乙”非甲乙之“乙”，而为乙鸟之“乙”^[32]。《说文》云：“乙，燕燕，乙鸟也。”又云：“燕，燕燕，玄鸟也”^[33]。乙鸟即是玄鸟，古人认为其知晓天时，为天帝的使者^[34]。《诗·大雅·商颂》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35]。玄鸟即为天帝之使。在汉画像石上就能见到玄鸟头戴本文称之为“天文冠”的三锋状冠的形象（图七）。玄鸟能戴天帝太一之冠，其与天帝太一的密切关系可见一斑，而玄鸟又与高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礼记·月令·仲春之月》云：“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谋，天子亲往”，郑玄注：“玄鸟，燕也。以施生之时来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为候。高辛氏之出，玄鸟遗卵，娥简吞之而生契，后王以为媒官”^[36]。可见，天帝太一（太乙）与高谋的关系也可从玄鸟上建立起来，高谋能享大牢之祠，而且天子亲往，正是得益于其与天帝太一的密切关系。

稍可旁及的是，《老子中经》云：“上上太一者，道之父也，天地之先也。……其神人头鸟身，状如雄鸡”^[37]。这与上述头戴太一之冠的人首鸟身画像有一定的相似性，然而上述画像中的人首鸟身神人形象多不突出，且多栖于阙、屋之上，有些还两两相对，不太可能具有天帝太一的神性，理解为天帝太一之使者应较妥当。不过，四川郫县新胜乡砖室墓出土一具画像石棺^[38]的后挡上，手托日、月的伏羲、女娲之间有一正面的人首鸟身神人，头上似亦戴太一之冠



图八 四川郫县新胜乡出土石棺画像拓本
(采自《四川郫县东汉砖墓的石棺画像》，《考古》
1979年第6期第497页图四)

(图八)。该神人处于伏羲、女娲和日、月正中，地位十分突出。其是否具有太一的神性，也是值得注意的。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上引《老子中经》中的早期道教观念就可以在东汉晚期的画像上找到更早的源头。

另外，陈梦家先生经过细致考证后曾经提出“高禖与社，是一不二”^[39]，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幅帛画“神祇图”上，有“大一”题记的神祇身上正题有“社”字^[40]。太一与高禖的关系或亦可从社上建立起来。

可见，天帝太一与高禖神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汉画像中被认作高禖神者确实也与麒麟岗汉墓中的天帝太一画像有着明显的相似性。这一方面可为高禖神画像的认定增强论证，另一方面也提出一个问题。高禖手拥伏羲、女娲，具有合阴阳、成天地的神性。《吕氏春秋·大乐》云：“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为阴阳”^[41]。阴阳既为太一所分化，则阴阳也可合于太一，分阴阳与合阴阳是一体两面。那么，汉画像中所谓的高禖神是否也具有太一的性质？就笔者目前所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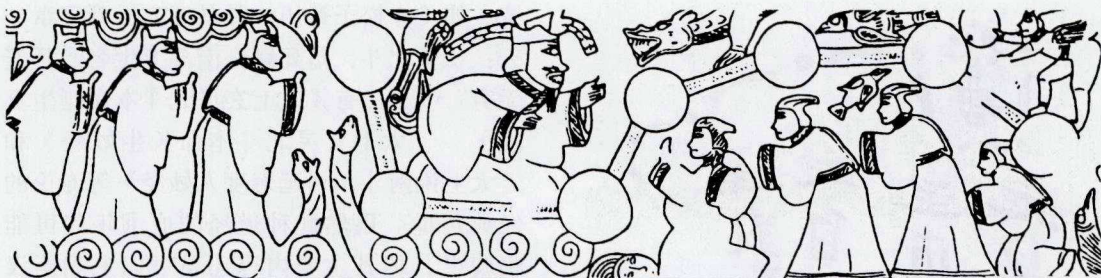
汉画像中此类手拥伏羲、女娲的大神并非都戴三棱形冠，其形象也有较大差异，要有进一步的理解还需全面梳理相关材料。

四、北斗与南斗

麒麟岗汉墓太一画像的最外侧左右对称配以北斗和南斗。北斗属于中宫，南斗属于北宫，本不呈对称分布，与天象不合，这样的设计必然有其特殊的含义。

北斗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上古时期观象授时最重要的指标。《史记·天官书》云：“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实际上，这种观念来源于上古时北斗曾处于天极位置的天象观察，时间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前后^[42]。由于岁差的缘故，汉代时的天极已偏离北斗较远了，但是这样的观念却保存下来，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由于北斗位处中宫，全年可见，又十分醒目，其绕极旋转，具有较易观察的指示时间、节令的作用，因而被人们作为极星，甚至作为极星的代表。如《春秋文曜钩》云：“中宫大帝，其北极星下一明者，为大一之先，含元气，以斗布常”^[43]。不过，麒麟岗画像中北斗并不居于中央，而是偏居外侧，也无旋转之势，显然不是这种观念的反映。

冯时先生通过对殷墟卜辞中比祭北斗记录的研究，认为比祭北斗或与祭祀司命有关^[44]，则在殷商人的观念中北斗又具有司命的神性，掌管着人的生杀寿夭。这种观念在汉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史记·天官书》云：“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四曰司命。”《河图帝览嬉》亦云：“斗七星，富贵之官也，其旁二星主爵禄，一星主寿夭”^[45]。于是便将北斗与司命紧密地联系起来，这里的司命还只是与北斗、斗魁相关，不少文献中更直接以北斗为司命。《淮南子·本经训》高诱注云北斗“撝起阴阳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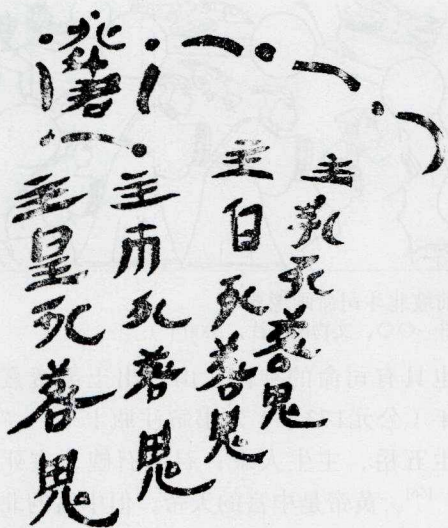
图九 山东嘉祥武氏祠前石室天井前坡北斗司命画像摹本
(采自信立祥：《汉画像石综合研究》第180页图一〇〇，文物出版社，2000年)

杀生万物也”^[46]。《续汉书·天文志》云：“太微天子廷，北斗魁主杀”，“天津为水，北斗主杀”，“流星为贵使，天辕为内宫，北斗魁主杀。”《太平经》亦云：“故（北斗）后六为破，天斗所破乃死，故魁主死亡”^[47]。《后汉书·赵壹传》亦云：“乃收之于斗极，还之于司命。”《三辅黄图·池沼》载汉高祖与戚夫人“竹下围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取丝缕就北斗星辰求长命乃免”^[48]。《汉书·王莽传》载王莽“铸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铜为之，若北斗……既成，令司命负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这显然又是王莽对天文的附会。《老子中经》亦云：“璇玑者，北斗君也，天之侯王也。主制万二千神，持人命籍”^[49]。早期道教中的此种观念显然来源于上述殷商以来的传统信仰。

汉代又有以黄帝为北斗神。《河图始开图》云：“黄帝名轩辕，北斗神也”，“黄帝名轩，北斗黄神之精”^[50]。《尚书帝命验》郑玄注：“黄帝含枢纽之府，而名曰神斗”^[51]。东汉时期的朱书解注瓶上常见“黄神北斗”^[52]一语。“黄神”即“黄帝”。《淮南子·览冥训》云：“西老折胜，黄神啸吟”，高诱注：“黄帝之神”^[53]；班固《幽通赋》云：“黄神邈而靡质兮”，李善注引应劭曰：“黄神，黄帝也”^[54]。传说中黄帝的出生也与北斗有关。如《诗含神雾》云：“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附宝而生黄帝”^[55]。而且黄帝（黄神）同北斗一

样也具有司命的神性。山西出土灵帝熹平二年（公元173年）朱书解注瓶上书：“黄神生五岳，主生人录；召魂召魄，主死人籍”^[56]。黄帝是中宫的天帝，但中宫的北极星已被其上的太一所占，故以中宫第二重要的星象——北斗来配黄帝也是合乎情理的。山东嘉祥武氏祠前石室天井前坡画像中北斗七星平置，斗魁中端坐一神人，头戴冠冕，面目显得威严、愤怒。斗魁前有神人作禀告状，其前地上横放一人头（图九）。信立祥先生认为：“根据《史记·天官书》中‘斗为帝车’的记载，图中的北斗云车就是天帝专用的‘帝车’，端坐车輿中的尊神就是天帝”^[57]。大多数学者持相同的看法。林已奈夫先生则认为此画像表现的应为北斗君^[58]。根据汉代壁画和画像中星官往往表现为星象结合神像的情况，笔者认为林氏之说似乎更有道理。此画像可能不完全是“斗为帝车”观念的反映，更可能是北斗星象和北斗神像的结合，北斗中的神即是北斗之精——黄帝。该神头戴冠冕，与武氏祠中的黄帝画像相同，而不同于前述头戴“天文冠”的最高天帝——太一。而且画像中该神作愤怒状，斗魁前有一人头，当是“北斗主杀”、“北斗魁主杀”的北斗司命观念的直接反映。虽然黄帝也是中宫天帝，画像上也可能结合了“斗为帝车”的观念，但笔者认为该画像最为突出的意义可能还是北斗司命、黄神北斗。

无独有偶，长安县三里村出土的一件



图一〇 长安三里村出土陶瓶北斗图像及朱书文字
(采自张勋燎、白彬：《中国道教考古》第一册第128
页图版壹：28，线装书局，2006年)

朱书陶瓶横向绘北斗七星，斗魁中书“北斗君”三字（图一〇），这与上述武氏祠中的画像何其一致，只是一则用神像表示、一则用文字表示而已。北斗下方题写四列文字，张勋燎先生考证为：“主乳死咎鬼，主自死咎鬼，主师死咎鬼，主星死咎鬼。”“乳死”即夭折，“自死”为自杀，“师死”为战争中被杀，“星死”为犯灾星而死^[59]。其观念背景仍为“北斗主杀”无疑，类似的朱书陶瓶在咸阳市渭城区窑店也有发现^[60]。

司命本是兼主生死的，但从上引《续汉书·天文志》及武氏祠北斗司命画像中我们看到似乎当时更强调北斗主杀的一面，而主生的一面后来则被南斗分担。晋干宝《搜神记》载汉末管辂云：“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从南斗；祈福皆向北斗”^[61]。生死是一对对立而统一的概念，合则为北斗司命，分则为“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南斗在古代天文学中的地位远不如北斗，南斗受生的观念应是由北斗司命的观念分化而对应出现的^[62]。这种分化或与阴阳思想有关，北为阴，故主杀，南为阳，故主生。这种观念在后来的道教中颇成系

统。如《赤松子章历·驿马章亦云开度章》云：“祈北斗，落死籍，南斗上生名，延寿无穷”^[63]。又有《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太上玄灵北斗本命长生妙经》和《太上说南斗六司延寿度人妙经》等专论的经典传世。虽然此种道经的成书年代可能稍晚^[64]，但其主要内容还是可以上溯至汉末^[65]。麒麟岗天象画像中两侧对称分布的南北斗无疑是这种南北斗主生主死、北斗司命观念的反映。南北斗对称分布于太一两侧，正如四象为四帝（五帝）夹辅太一，也当是司命辅佐太一的表现。《史记·封禅书》云：“寿宫神君最贵者太一，其佐曰太一、司命之属。”与南北斗夹辅太一的画像意义相合。前述王莽以司命负威斗侍奉御驾，也正暗合了这一观念。

司命不仅掌管生死，还能使人死而复生。《后汉书·赵壹传》云：“乃收之于斗极，还之于司命，使干皮复含血，枯骨复被肉，允所谓遭仁遇神，真所宣传而著之。”《庄子·至乐》记庄子梦到骷髅时对其说：“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66]。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墓主记》中一则云：“丹所以得复生，……以丹未当死，因告司命史公孙强”^[67]。墓葬中的司命信仰也许可以从这个角度予以考虑。

五、太一与升仙

南北斗司命夹辅太一的画像可能与生死和升仙的观念有关。在汉代人的观念中长生不死或死而复生与升天成仙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淮南子·览冥训》云：“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68]，即是得不死之药而飞升上天。《淮南子·坠形训》又云：“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69]。记载的也是先获得不死之身再登天成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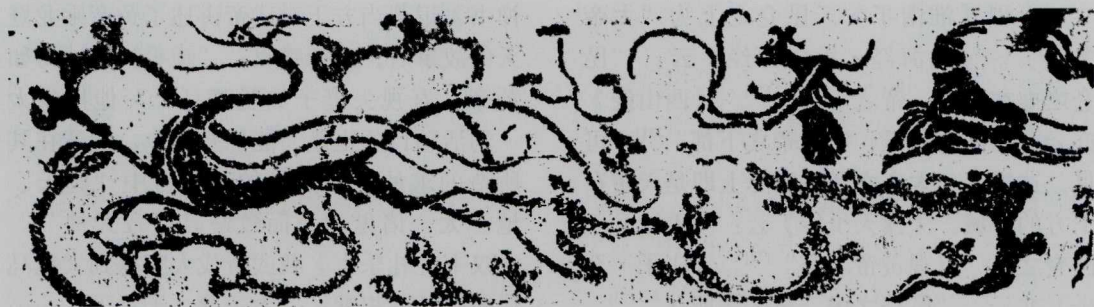
上引《淮南子》云昆仑之上为“太帝之居”。《山海经·海内西经》云：“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70]。《西山经》亦云：“昆仑之丘，实惟帝之下都”^[71]。可见，这里的“太帝之居”实际上即是天帝在下方的都城。《穆天子传》云：“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72]。《庄子·至乐》亦云：“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73]。可见，在汉代以前昆仑上的太帝为中宫天帝——黄帝，但如前所述，汉武帝以来以太一为最高天帝，则此时昆仑之上的太帝便应为太一，黄帝配居其下。《汉书·王莽传》引《紫阁图》云：“太一、黄帝皆仙上天，张乐昆仑。”是其明证。

昆仑在汉代人的观念中为大地之中心，上对天极——北极、北辰。《水经·河水》云：“昆仑墟在西北，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注引《禹本纪》与此记载相同^[74]。《河图括地象》亦云：“地中央曰昆仑，昆仑东南万五千里，名曰神州。”又云：“地部之位，起形高大者，有昆仑山。……其山中应于天，最居中，八十城市绕之。中国东南隅，居其一分”^[75]。《周礼·春官·大司乐》郑玄注：“天神则主北辰，地祇则主昆仑”^[76]。《春秋命历序》亦云：“天体始于北极之野，地形起于昆仑之虚”^[77]。既然昆仑下处地心，上对天极，则为天地的中轴，为通天之中心天柱。《龙鱼河图》云：“昆仑山，天中柱也”^[78]。《河图括地象》云：“昆仑山为天柱，气上通天。昆仑者，地之中也。”又云：“昆仑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79]。《神异经·中荒经》亦云：“昆仑之山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80]。可见，昆仑之上即是天极，为太一所在，登上昆仑即可登天成仙，太一为昆仑升仙信仰中的最高神。

汉武帝听取方士的建议始奉太一为最高天帝，而汉武帝崇奉太一和黄帝明显与其希望登天成仙的求仙活动有关。《史记·封

禅书》记载当方士对武帝讲述了黄帝乘龙登天的故事后，武帝感叹：“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他推崇太一的活动目的也是“能仙登天”。武帝在其所造的求仙意味浓厚的甘泉宫中“画天、地、太一诸鬼神，而致祭具以致天神”。

《汉书·礼乐志》载武帝伐大宛得到大宛马后所作的郊祀歌：“太一况，天马下。……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徕，开远门，踈予身，逝昆仑。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颜注：“此言天马乃太一所赐，故下来也。”又引文颖云：“言武帝好仙，常庶天马来，当乘之往发昆仑也。”又引应劭云：“阊阖，天门。玉台，上帝之所居。”不少学者认为武帝伐大宛得天马的重要目的是升仙^[81]，而来自西极的天马能承载他上昆仑、进天门、观玉台，正是因为天马是昆仑之上的天帝太一所赐，可见崇拜太一的目的就是为了登昆仑而升天成仙。贾谊《惜誓》云：“飞朱鸟使先驱兮，驾太一之象舆。……驰骛于杳冥之中兮，休息乎昆仑之墟”^[82]。这里的“太一之象舆”显然与太一所赐的天马一样，皆是能载人逝昆仑、游阊阖、观玉台的神兽，汉画像中经常出现的有翼天马与象舆、象、仙人乘象显然应与此种观念有关。班彪《观海赋》亦云：“麾天阊以启路，辟阊阖而望余。通王谒于紫宫，拜太一而受符”^[83]。《史记·孝武本纪》正义引《汉书起居》云：“李少君将去，武帝梦与共登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龙时从云中云‘太一请少君’，帝谓左右‘将舍我去矣’。数月而少君病死。又发棺看，唯衣冠在也。”可见，汉代的太一崇拜确实与升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此种观念亦为后来的道教所继承。陶弘景《登真隐诀》云：“行之十五年，太一遣保车来迎，上登太宵”^[84]。《真诰·稽神枢》云：“庐江潜山中，有学道者郑景世、张重华，……北玄老太一迎以云骈，白日升



图一一 河南南阳麒麟岗汉画像石墓门楣龙车升仙画像拓本
(采自黄雅峰、陈长山:《南阳麒麟岗汉画像石墓》第137页图版40,三秦出版社,2008年)

天”^[85]。《云笈七笈·尸解》亦云:“因闭目咽气九十息毕,开目忽见太一以天马来迎于寝卧之前”^[86]。这显然与汉武帝的“太一况,天马下”是一脉相承的,不过,后世道教有自己的神阶体系,太一已不复最高天帝的地位了。

根据上面的论述,笔者相信麒麟岗汉墓中的太一天象画像在墓葬中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对天象的模拟,它强烈地表达着登昆仑、拜太一而升天成仙的愿望。事实上,紧接该天象画像的门楣上正是一整幅驾驭龙车而飞驰于云气之间的画像,有可能即是墓主乘龙升天的表现(图一一)。

六、结 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麒麟岗汉墓画像中端坐于四象、日月、南北斗之间的即是最高天帝太一,其头上所戴的三锋状冠可能为文献中提到的“天文冠”,象征着合天一三星而成的“太一锋”,亦为后世道教中三锋冠之来源,四象围绕太一是四象(或许代表五帝)夹辅太一的表现。汉画像中所谓的高谋神头戴天文冠,左右手分拥伏羲、女娲,与麒麟岗太一画像颇有相似之处。实际上,高谋与太一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汉画像上的高谋神是否也具有太一的性质尚待进一步讨论。太一画像外侧相对称的南北斗是南北斗司命、司命辅佐太一的表现。学界普遍认

可的武氏祠前石室天井前坡的“北斗帝车”画像实际上并非最高天帝,而是北斗司命、黄神北斗。汉代有以黄帝为北斗,黄帝辅佐太一正如司命辅佐太一。汉代的太一崇拜与昆仑升仙信仰有密切关系,整个画像应是升天成仙愿望的表现。据笔者考察,麒麟岗画像石墓的墓主应贵为王侯^[87],墓中出现太一或与其身份有关。

附记:本文为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考古所见汉代天文材料的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4CKG016)的阶段性成果。文章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冯时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陈鹏博士提出宝贵意见,谨致谢忱!

注 释

- [1] 韩玉祥、牛天伟:《麒麟岗汉画像石墓前室墓顶画像考释》,见《南阳汉代天文画像石研究》,民族出版社,1995年。
- [2] 黄雅峰、陈长山:《南阳麒麟岗汉画像石墓》,三秦出版社,2008年。
- [3] 也有学者认为是羲和、常羲或阴、阳二神,笔者这里认同伏羲、女娲之说。
- [4] 南北斗不当在四象之外,也非对称分布,其配置意义详见后文。
- [5] 有学者认为其是黄帝,不确,详见后文。
- [6]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上册第32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7] 在汉代经学“家法”的背景下,对这几个名称

- 的解释不少经学家还有些不同，然而论其实质则无二致。
- [8] 《周礼注疏》卷一八《大宗伯》贾公彦疏引，见《十三经注疏》上册第7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 [9] 《尚书正义》卷三《虞书·舜典》，见《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2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 [10] 同[6]，中册第662页。
- [11] 同[2]，第74页。
- [12] 《史记·封禅书》。
- [13] (日)林巳奈夫：《汉镜の图柄二、三について》，《东方学报》第44册，1973年。
- [14] 李零：《湖北荆门“兵避太岁”戈》，《文物天地》1992年第3期。
- [15]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第26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 [16] [晋]郭璞注、王根林校点：《穆天子传》卷三，见《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第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 [17] [宋]张君房编、李永晟点校：《云笈七签》卷十八《老子中经》第一册第419、425页，中华书局，2003年。
- [18]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第一册第5页，中华书局，1961年。
- [19] 《道藏》(三家本)第十八册第228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
- [20] 《礼记正义》卷十五《月令》，见《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3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 [21] 信立祥：《汉画像石综合研究》第149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
- [22] 顾颉刚：《三皇考》，见《古史辨自序》下册第219~24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 [23]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第57页，中华书局，1983年。
- [24] [汉]刘安著、高诱注：《淮南子注》卷三《天文训》，见《诸子集成》第七册第37页，上海书店，1986年。
- [25] 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第64页，中华书局，1985年。
- [26] [唐]徐坚等：《初学记》卷九第196页，中华书局，1962年。
- [27] [汉]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下册第599页，中华书局，1981年。
- [28] 同[26]。
- [29] [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上册第50页，中华书局，1994年。
- [30] 同[20]。
- [31] 闻一多：《伏羲考》第1~7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32] 曹胜高：《“太一”考》，《洛阳大学学报》第17卷第3期，2002年。
- [33]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584、5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 [34]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第25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 [35] 《毛诗正义·大雅·商颂》，见《十三经注疏》上册第6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 [36] 同[20]。
- [37] 同[17]，第418页。
- [38] 四川省博物馆、郫县文化馆：《四川郫县东汉砖墓的石棺画像》，《考古》1979年第6期。
- [39] 陈梦家：《高谋郊社祖庙通考》，《清华学报》第12卷第3期第450页，1937年。
- [40] 周世荣：《马王堆汉墓的“神祇图”帛画》，《考古》1990年第10期。
- [41] 《吕氏春秋》卷五《大乐》，见《诸子集成》第六册第46页，上海书店，1986年。
- [42] 同[34]，第128页。
- [43] 同[6]，中册第662页。同书又云：“中宫大帝，其精北极星。”
- [44] 同[34]，第143~146页。
- [45] 同[6]，下册第1135页。
- [46] 《淮南子注》卷八《本经训》，见《诸子集成》第七册第117页，上海书店，1986年。
- [47] 王明：《太平经合校》第304页，中华书局，1960年。
- [48]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第267页，中华书局，2005年。
- [49] 同[17]，第425页。
- [50] 同[6]，下册第1105页。
- [51] 同[6]，上册第367页。
- [52] 张勋燎、白彬：《中国道教考古》第一册第165、168、174页，线装书局，2006年。
- [53] 《淮南子注》卷六《览冥训》，见《诸子集成》第七册第96页，上海书店，1986年。

- [54]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一四《幽通赋》第209页，中华书局，1977年。
- [55] 同[6]，上册第461页。
- [56] 同[52]，第160页。
- [57] 同[21]，第181页。
- [58] (日)林巳奈夫：《汉代的鬼神世界》，见《汉代の神神》第161页，临川书店，1989年。
- [59] 同[52]，第128页。
- [60] 刘卫鹏、李朝阳：《咸阳窑店出土的东汉朱书陶瓶》，《文物》2004年第2期。
- [61] [晋]干宝撰、李剑国辑校：《新辑搜神记》第66、67页，中华书局，2007年。
- [62] 韦兵：《道教与北斗生杀观念》，《宗教学研究》2005年第2期。
- [63] 同[19]，第十一册第204页。
- [64] 任继愈：《道藏提要》(第三次修订本)第271、27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 [65] 萧登福：《〈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探述》，《宗教学研究》1997年第3期；《〈太上说南斗六司延寿度人妙经〉探述》，《宗教学研究》1998年第2期。
- [66] [清]郭庆藩辑：《庄子集释》，见《诸子集成》第三册第273页，上海书店，1986年。
- [67] 李学勤：《放马滩简中的志怪故事》，《文物》1990年第4期。
- [68] 同[53]，第98页。
- [69] 《淮南子注》卷四《坠形训》，见《诸子集成》第七册第57页，上海书店，1986年。
- [70] 袁珂：《山海经校注》(增补修订本)第344页，巴蜀书社，1993年。
- [71] 同[70]，第55页。
- [72] 同[16]，卷二第10页。
- [73] 同[66]，第272页。
- [74] [北魏]酈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一《河水》第1页，中华书局，2007年。
- [75] 同[6]，下册第1089、1095页。
- [76] 《周礼注疏》卷二二《大司乐》，见《十三经注疏》上册第79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 [77] 同[6]，中册第885页。
- [78] 同[6]，下册第1154页。
- [79] 同[6]，下册第1091、1092页。
- [80] 王根林点校：《神异经》，见《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第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 [81] a.余英时著、侯旭东等译：《东汉生死观》第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b.霍巍：《天马、神龙与昆仑神话》，见《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西南的对外文化交流》第200页，巴蜀书社，2007年。
- [82] 同[23]，第228页。
- [83]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八《水部上》第152页，中华书局，1965年。
- [84] [梁]陶弘景撰、王家葵辑校：《登真隐诀辑校》第47页，中华书局，2011年。
- [85] [梁]陶弘景撰、赵益点校：《真诰》卷十四《稽神枢》第252页，中华书局，2011年。
- [86] 《云笈七签》卷八十四《尸解》第四册第1896页，中华书局，2003年。笔者对标点有所调整。
- [87] 王煜：《汉代太一信仰的图像考古》，《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责任编辑 洪石)